

王陽明全集

上



B248.2
1

85325



200112387

上

王陽明全集

明 王守仁 撰

吳光 錢明 董平 姚延福 編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0602/3

B248.2/1:1

85326



200112378

下

明 王守仁 撰

王陽明全集

吳光 錢明 董平 姚延福 編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滬新登字109號

王 陽 明 全 集

(全二冊)

(明) 王守仁 撰

吳 光 錢 明 蕭 平 姚延福 編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郵寄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廠印刷

開本850×1156 1/32 印張53.875 插頁12 字數1,141,000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4,000

ISBN 7-5325-1242-8

B·133 定價 34.90 元



圖一 王陽明遺像
(原件藏餘姚市文物保管委員會)



圖二 餘姚中天閣——王陽明講學處遺蹟
(餘姚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供稿)

寓贛州男王雲百拜書上

父親大人膝下久不得信心切懸問者

鄉人言略聞消息云

祖母老大人

大人下教居萬福梢以爲慰男自正月初

四出征剿賊三月中旬始得回軍賴

大人蔭庇盜賊略已底定雖有殘黨不

圖三 王陽明手蹟

(原件藏餘姚市文物保管委員會)

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一

語錄

一

傳習錄上

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
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
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
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
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
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
之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書數月心香

圖四 明隆慶六年刊本《王文成公全書》書影
(浙江圖書館古籍部藏本)

王陽明和他的心學(代序)

沈善洪 王鳳賢

王陽明是中國明代中葉著名的哲學家，也是一位重要的教育家。陽明心學作爲一種社會思潮，不僅在當時風靡一時，而且影響後世，波揚東瀛，直至當代還是海內外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，我國學術界對陽明學多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。進入八十年代以來，學術界對宋、明理學的研究相當活躍，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評價王學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進一步深入研究 and 評述王陽明學說，仍然是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。爲此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組織有關專家，新編了王陽明全集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爲學術界深入研究陽明學提供了方便。

一

王陽明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浙江餘姚人，生於明成化八年（一四七二），卒於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（一五二九年一月九日），終年五十八歲。因爲他曾經隱居會稽陽明洞，又創辦過陽明書院，故世稱陽明先生。王陽明二十八歲中進士，曾經擔任過知縣、刑部主事、兵部主事、吏部主事、左僉

都御史、南京兵部尙書等職。

童年時代，王陽明就善於思索問題。據年譜記載，他入塾讀書時，曾問塾師「何爲第一等事」？塾師回答說：「惟讀書登第耳。」王陽明表示懷疑，他說：登第恐怕「未爲第一等事」，「學聖賢」才是第一等事（見王文成公全書，下引該書均不加注）。

青年時代的王陽明，就關注北方邊境的安全。十五歲那年，他出遊居庸三關，觀山河形勝，感慨萬分，曾賦詩感嘆維護邊境安全的重要性。後來，王陽明又向明孝宗皇帝疏陳邊務八條，建議採取「蓄財以備急」，「舍短以用長」，「簡師以省費」，「屯田以足食」，「行法以振威」，「數恩以激怒」，「捐小以全大」，「嚴守以乘弊」等措施，以加強北方防務。

我國明代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，是朝廷內部實行殘酷的特務統治，各種特務機構都由宦官掌握。在同這種惡勢力的鬥爭中，王陽明表現了剛直不阿的精神。武宗正德年間，當宦官劉瑾胡作非爲，矯旨將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逮捕入獄時，王陽明不畏艱險抗疏引救。他在上疏中義正辭嚴地指出：「君仁則臣直」，「今乃赫然下令，遠事拘囚」，「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」，「苟念及此，寧不寒心」。爲此，王陽明遭到了劉瑾一夥的殘酷迫害，被廷杖四十，貶謫到貴州龍場驛當驛丞，受盡折磨，幾至於死。以後，王陽明雖爲朝廷效力多年，但終因統治集團內部鬥爭複雜，繼續遭受宦官勢力的誣陷和打擊。正因爲這樣，王陽明在奏疏和書信中，有不少抨擊王室內部奸黨活動的內容。

王陽明在貴州龍場度過了三年苦難生活之後，於正德五年（一五一〇）出任江西廬陵縣知事。不

久，又升任爲南京朝廷官員。正德十四年（一五一九），明王朝的宗室寧王朱宸濠在江西起兵謀反。王陽明奉命平定了寧王叛亂。在平亂過程中，王陽明發現「寧賊宸濠，志窮荒度，肆謀併吞」，強佔「民間田地」，擅自增加稅額，「利歸一己，害及萬家」的狀況，並在計處地方疏中，對於被朱宸濠一夥強佔的民田民產，提出了處理意見，主張將「百姓之田產」，「給還本主管業」。王陽明敏銳地覺察到當時農民暴動所以彼伏此起，或是爲官府所迫，或是爲大戶所侵。王室和權貴掠奪兼併土地的行爲，不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，所以他採取了明確反對的態度。由此可見，王陽明確是一位較有遠見的人物。

王陽明任職期間，曾主張實行一些減輕人民負擔、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。正德十四年（一五一九）七月三十日，他在旱災疏中反映，當時「江西之民」，由於「軍旅乾旱，一時並作」，深受「廢耕耘之業，事征戰之苦」，雖富室大戶，不免饑饉；下戶小民，得無轉死溝壑，流散四方，「饑寒交迫」。因此，他要求「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」。同時，王陽明揭露當時朝廷有關「寬恤之令」、「賑濟之典」，均屬「虛文」，而且往往採取「一以爲蠲免，一以爲追征」的做法，導致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，下使百姓歸怨於上」。王陽明主張實行這些措施，爲的是「思邦本之當固，慮禍變之可憂」。但他能比較如實地反映「小民困苦已極」的實際狀況，是值得稱道的。

在從政的同時，王陽明一向關注學術問題。他的學術思想的形成和發展，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。黃宗義參照王畿的記載，在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中，分析了王學在它的形成過程中和形成以

後，各有「三變」，也就是各有三個發展階段。所謂「王學形成過程中的「三變」，指的是「遍讀考亭（即朱熹）之書」，即學習程朱理學；「出入於佛、老」，即受到佛、道思想的影響；「忽悟格物致知之旨」，即心學思想的初步形成。至於「王學形成以後的「三變」，一是「以默坐澄心爲學」；二是「專提致良知三字」；三是「所操益熟，所得益化」，學說和修養到了完全成熟的地步。

王陽明開始學習時，主要是應付科舉考試，「泛濫於詞章」。不久即「遍讀考亭之書」，鑽研起程朱理學來了。他十八歲那年，路經江西廣信，曾謁見理學家婁諒（即婁一齋），聽取他講述朱熹學派的哲學觀點。後來，王陽明白天聽塾師講析經義，晚上搜取經書，讀至深夜。當時，他爲了準備參加科舉考試，還學習詩賦詞章，鑽研八股文。王陽明是個善於思索的人，他雖然接受了朱熹的哲學觀點，但並不盲從。他與友人錢某，按照朱熹所說的「格物致知」的道理，去格父親官署庭中的竹子，結果竹子的道理沒有格出來，他反而病倒了。於是，他開始感到朱熹那種把「物理」與「吾心」分割爲二的學說不可信。隨着王陽明政治活動和學術活動的進展，使他越來越感到朱熹的學說「支離決裂」，不利於振興封建道德，挽救明王朝的危機，就對朱熹這種「物理吾心終判爲二」的學說，採取了批判的態度。

王陽明學術思想發展的第二個階段，是所謂「出入於佛、老」。他早年就同道士、僧侶有過交往。後來，從失望於程朱理學，到自己哲學觀點正式形成以前，他曾把學術活動的興趣轉向道教和佛教方面，企圖從中尋求修身治國的道理。隱居紹興陽明洞的時候，曾按道家的方法修養。靜坐久了，

有時想遠離人世。但終因拋不開傳統倫理的制約，挂念祖母和父親，又從洞中跑了出來，並表示醒悟說：「此念生於孩提，此念可去，是斷滅種性矣。」從此以後，王陽明漸漸覺得佛、道不對頭。有一次，王陽明聽到學生王嘉秀、蕭惠好談佛、道，就說：他自己也曾「篤信二氏」，但後來通過「居夷三載」的磨練，才懂得了「聖學」的道理，「悔錯用功二十年」，所以，只有「篤志聖學」，才能識破佛、道「二氏之學」不可信。這就是王陽明從信奉到離開佛、道的過程。

既然「支離決裂」的程朱理學，和超脫塵世的佛、道之學，對於修身治國都無濟於事，王陽明的學術思想就發展到了第三個階段，即創立「心學」體系的階段。一五〇五年，王陽明三十四歲，在北京與具有心學傾向的陳獻章的學生湛若水交上了朋友，共同倡導所謂「聖人之學」。第二年即被貶謫到貴州龍場。王陽明在龍場期間，一度意志消沉，日夜端居澄默，以求靜一。久而久之，胸中澆澆，思念聖人此處，更有何道？據說，一天夜裏，他大悟「格物致知」的道理，始知「聖人之道，吾心自足」，過去向事事物物求理是錯了。他默記「五經」的內容，來論證他所悟的一切「求諸於心」的道理，據說沒有不符合的。這就是所謂「龍場之大悟」。王陽明在確立了他的「心學」思想以後，不斷豐富和發展其內容。正德四年（一九〇九），他在貴陽書院講述了「知行合一」之說。正德十六年（一五二一），他又在南昌開始揭示「致良知」的學說。

二

我國宋、元、明時代，封建國家的中央集權專制更加強化，封建的三綱五常等倫理道德規範更加嚴格，隨着封建社會的日趨沒落，產生了宋明理學。這種理學的創始者，通常稱爲「北宋五子」，即周敦頤、邵雍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。朱熹（一一三〇——一二〇〇）着重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特別是程頤的學說，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，這就是所謂「程朱理學」。從此以後，朱熹就成了理學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。作爲理學家哲學的最高範疇的「理」，一般都是指的一個精神性的本體，在一定意義上，他們所講的「理」實際上就是封建的三綱五常。他們把封建倫理道德規範奉爲「天理」，作爲派生一切、決定一切的宇宙本體。如前所說，王陽明也經歷過一個從信奉到懷疑、批評朱熹理學的過程，最後終於建立了他自己的心學體系。

所謂「本心」之學，孟子就提出來了。即便在理學家程朱那裏，也不乏論「心」的內容。到了南宋，出現陸象山的「心學」思想，其基本觀點爲「心即是理」，「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」。（陸象山全集卷三十六年譜）但他的心學並沒有形成理論體系，所以在「朱陸之爭」中未能取勝。到了元代，理學內部出現了一種「和會朱陸」、「朱陸合流」以至「宗陸背朱」的傾向。王陽明的心學體系，就是順應思想界的這種潮流，在宗孟子的「本心」之學，並繼承和發展陸象山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。

王陽明心學體系的形成，不僅有它的理論來源，更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。明代中葉，封建統治面臨着嚴重的危機，王陽明在分析當時「天下之不治」的原因時說：「今天下之不治，由於士風之衰薄。士風之衰薄，由於學術之不明。學術之不明，由於豪傑之士者之不倡焉耳。」所謂「士風之衰薄」，就是社會風氣不正，特別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人物不遵守封建的道德規範。至於「學術之不明」，是針對當時佔統治地位的朱熹理學而發的，因為這種「支離決裂」的煩瑣學說，不僅不能在實踐中貫徹封建道德準則，反而造成「流入空虛」「言行不一」的惡習。所以要有像他那樣的所謂「豪傑之士」提倡一種新學說取而代之。在他看來，要治理當時的社會，只有在他的「心學」的指導下，通過「誠意」「正心」，加強封建的道德修養，「去人欲，存天理」，才能平息統治集團內部勾心鬥角之爭，才能對付所謂「破山中賊易，破心中賊難」的問題。由此可見，王陽明的心學體系，是我國明代中葉各種社會矛盾的產物。不過，明代中葉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因素已經在封建社會內部發生，這種社會現實也不能不對王陽明的思想發生影響。這在他的著作中是有所反映的。他雖然基本上還固守「農本商末」的思想，但肯定商人「終歲棄離家室，辛苦道途，以營什一之利，良亦可憫」，主張「免抽」或抽合理商稅，支持正當的商業活動。在治理地方府縣的問題上，王陽明主張建設「街道市廛，俱有次第，商賈往來，漸將貿易」的「富庶之鄉」。正因為王陽明的思想受到當時新經濟因素的某些影響，加上他在親身的經歷中，深深感到朱熹為代表的理學，不能挽救明王朝的危機，才倡導他那比較強調人的主體意識能動作用的心學來取代它。應當看到，王陽明以「吾心」作為判斷是非、善惡的標準，

提倡「活潑潑」的「良知」學說，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反映了當時開始出現的市民階層的意願。

王陽明的哲學，集我國古代心學之大成，建立了龐雜的心學體系。從此，「陸王心學」成了宋明理學內部與「程朱理學」相對立的一個重要學派。他把「吾心」作爲宇宙萬物的本源，認爲「心」是宇宙間「天淵」，萬物的「主宰」，說甚麼「位天地，育萬物，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」。對於這種把「心」（精神）抬高到宇宙本體地位的心學體系在理論上的錯誤，筆者在王陽明哲學研究等著作中，已經作過分析和批判。但我們卻不能不注意發現，正是這種心學思潮，在衝破傳統觀念束縛方面起過積極的作用。王陽明一切從「吾心」出發，以「吾心」爲判斷是非標準的思想，衝擊了長期被朱熹思想所控制的局面，起到了活躍學術空氣，解放人們思想的作用。王陽明明確主張：「學貴得之於心」。如果「求之於心而非」，「雖其言出之於孔子」，也「不敢以爲是也」；要是「求之於心而是」，「雖其言出之於庸常」，亦「不敢以爲非也」。至於朱熹的「改正補輯」之類，那就更不能作爲是非的標準了。他還明白宣告：道是「天下之公道」，學是「天下之公學」，非孔子、朱子「可得而私也」。要知道，在長期神化孔子和以朱學爲官學的情況下，如此大膽地提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爲是非，否認孔學、朱學的絕對權威性，不能不視爲一種勇敢的言辭。

在確立了「吾心」爲宇宙本體的基礎上，王陽明又倡導了「知行合一」之說。這種「知行合一」論，是針對朱熹的「知先行後」論提出來的。朱熹在談到知和行的關係時說：「論先後，知爲先。」「義理不明，如何踐履？」（朱子語類卷九）這種理論，在認定人的行爲由一定的思想所指導這一點上是合理

的，但卻從根本上顛倒了知和行的關係，因而成了道學家空談義理，不幹實事，言行脫節的一種借口。南宋思想家陳亮就會經指出：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，理學家終日空談性命，出現了「相蒙相欺」，「百事不理」（龍川文集卷十五送吳允成運幹序）的壞風氣。到了明代中葉，這種情況就更嚴重了。王陽明說他的「知行合一」說，是「專爲近世學者分知行爲兩事」而倡導的。他批評朱熹的理論割裂了「知」和「行」的關係，片面強調「先用知之之功而後行」，其惡果，一方面使人們局限於「知之之功」，牽制纏繞於言語之間；另一方面，使學者「不能著實體履」，「遂致終身不行」，即不能把封建道德付諸實行。因此，他才提出「知行合一之說」來「補偏救弊」。

由此可見，王陽明的「知行合一」論，在倫理學的意義上說，「知」是一種「德性之知」，「是爲良知，而非知識也」。「知行合一」，講的是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爲的統一。在王陽明看來，「知行的本體」是「同一」的，如果言行不一，「此已被私欲隔斷，不是知行的本體了」。從道德修養的角度說，強調「言行一致」，「篤實躬行」，無疑是正確的。但是，王陽明的「知行合一」論，還包含着回答認識論上「知」與「行」的關係問題。從這個意義上所講的「知」，是一種「見聞之知」，屬於知識的範疇。王陽明明確反對「知先行後」論，強調「食味之美惡，必待入口而後知」；「路歧之險夷，必待親身履歷而後知」。他還把「天時」、「地理」、「食貨」、「物產」，看成是先於「官政」、「學校」、「選舉」等等而存在的，得出了「物產而事興」的論斷；並肯定「天地之運，日月之明，寒暑之代謝，氣化人物之生息始終」，都是合乎規律的自然現象，而且在說明「天時」與「人事」的關係時，認定人在自然規律面前不是無能爲力的，從而